

鲁洁

口述

Huiwang Bashi Nian

回望八十年

鲁洁教育口述史



Kullawa Basha Moon

回嗚，三十年

香港政府口述史

上環區

回望八十年

鲁洁教育口述史

鲁洁◎口述



高德胜 刘晓东

吕丽艳 余维武 汪凤炎

整理

教育科学出版社

·北京·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李宗喜
版式设计 杨玲玲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望八十年：鲁洁教育口述史 / 鲁洁著.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041-8418-4

I. ①回… II. ①鲁… III. ①鲁洁—回忆录 IV. ①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5008号

回望八十年——鲁洁教育口述史

HUIWANG BASHINIAN LUJIE JIAOYU KOUSHUSHI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1259
传真 010-64891796 网址 <http://www.esph.com.cn>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作 阳光图文工作室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3月第1版

开本 169毫米×239毫米 16开

印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3.75

定价 52.00元

字数 260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历练自己的灵魂

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觉得要有个基本共识,因为个人生活史就是生命史,它可能成为一种闲言碎语、一种供人娱乐的东西,这样看起来也比较轻松。很多人对年纪大的人一点也不了解,也希望知道你是怎么活过来的。

现在这个时代是所谓“娱乐至死”的时代,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当成一种游戏,作为一种娱乐来看待。是写成这样“娱乐”的东西,还是写成一种有意识地启发大家去思考,看特定时代的人物怎么生存和发展的东西,需要事前想清楚。

另外,现在做这个东西,有没有教化别人的嫌疑?一种生命史、生活史,它其实是对宏大叙事的历史的一种补充。我认为,宏大叙事的历史肯定是要的,因为你不知道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整个大的事件的直接连接,很多琐碎的事情你就不明白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不能像后现代那样去排斥宏大叙事。口述史作为一种补充,我认为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是那种比较细节

化的、鲜活的、一种个人生活经验的总结,把它从隐藏的历史中显现出来,通过细节化的、鲜活的个人经验,提取出一种历史的走向。

我认为,个人化的生活史,和我们作为知识分子,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关怀、文化关怀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做这件事?实际上还是在关怀我们自己:作为大学里面的学者、一名知识分子,是如何生存的。我认为应该有一种比较大一点的关怀,不是关心你个人,不是你个人小时候做了什么,你爸爸妈妈做了什么,目的不在这个地方,还是应该有一种比较宽大的目的,一种生存的关怀和文化的关怀。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通过这样叙述,我们可以激活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认识。

这样的历史里有个体生命在里面,就像我们在小学讲历史的时候,比如鸦片战争,光是概括讲述是不行的,应该有个人的具体的活动在里面。我们讲宏大叙事的时候,往往把个人的活动、生命的经历、个人的情感、意愿等全都湮没了。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对我们认识宏大历史有激活作用。现在关注这种历史讲述方式可能是有道理的,就是把个人的生命遭遇带到整个历史叙事中——比如说带到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遭遇——去理解。实际上是让个人与历史对话。现在搞历史,包括我们现在有的博士后,关注具体的学校里面的人、学校里面的教师,也是这种路子,我认为还是有道理的。

中国古代就有“野史”,与所谓正史相互补充。个人讲述不仅是一种事实的描述,因为在讲的过程中,讲述者本人是这个中间的人,有一种生命的体验,能把生命的体验和事实描述交互起来。有时候你去看个东西,好像是很客观的,但它里面如果没有亲历者的体验,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有多重意义。

从个人来讲,我本来不想做这件事情,当然有多重的理由。实际上回忆过去也是很痛苦的。我看到一个材料,是说东方有个宗教叫“咖伽摩教”。这个教会有个理念,就是人临死的时候,要把自己过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重复一遍,而且这个重复不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你对象的立场上。比如我跟刘晓东说过什么话,我就要站在刘晓东的立场上,去重复这句话,或者我对你施加了某种活动或做了什么事情,我就要站在你的立场上,重复我做过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很有道理,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

当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想我当时做的这些事情,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去做,也会忏悔。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我父亲那个时候已经回到北京了,我估计北京当时的食品紧张程度比南京更严重,那个时候基本没有什么东西吃,连毛泽东的小孩都饿得回家抱怨。当时我在南京,带着女儿,就三口人,日子还过得去,因为我们几个胃口也不是很大,我还可以把粮票送给别人。父亲从香港回来,感觉到这里与香港的生活差别太大,他就写信到香港去,找香港的朋友寄些食品回来,主要是火腿等食品。有一次他托香港的朋友给我邮寄了个包裹。两代人处理许多事情的方式是不同的,我那时不能体会到他的心情,收到包裹的时候很生气。当时想,我们中国人不至于要吃嗟来之食吧,应当有骨气。于是我就把它退回去了。退回后我也没告诉父亲,但他的朋友还是告诉了他。我父亲很生气,把我骂了一顿:“现在这样子的困难,你还打肿了脸充胖子。”他骂我,我就更生气,很长时间都不理他,也不给他写信。当时感觉做这种事情就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我哥哥也赞同我,说:“你不要理他。”他总是从香港寄东西回来,当时感觉是很丢脸的。港台关系、海外关

系当时是一个大忌讳。子女还要工作和生活,他从香港寄东西回来,公安局是会注意的。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就觉得很伤他的心,他确实出自一种真诚的关怀。所以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人年纪大了以后,会变得宽厚一点,能做换位思考。当你换位思考时,就会觉得自己做的许多事情很愚蠢,对别人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回想这些事情,对我是一种痛苦。但是我想,恐怕这也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它能历练自己的灵魂,能让灵魂升华。这个换位思考的过程对我来讲有一种升华作用。

目 录

contents

- 001 前言 历练自己的灵魂
- 001 1. 我的父亲鲁继曾
- 031 2. 我的母亲杨进美
- 045 3. 我的哥哥和姐姐
- 057 4. 我的童年
- 075 5. 我的小学与中学生活
- 097 6. 我的高中生活
- 113 7. 考大学
- 119 8. 金女大的神韵
- 131 9. 地下党
- 147 10. 解放
- 165 11. 反右
- 177 12. “文革”前

目 录

-
- 199 13. “文革”十年
219 14. 重建教育学
233 15. 德育学科建设
245 16. 道德教育的现代化：反思与重建
253 17. 学术思想的演进
261 18. 学术行政工作
275 19. 德育课程开发
293 20. 婚姻·家庭
303 21. 我的读书观
317 22. 我的教学生涯
343 23. 教育向何处去
357 后 记



我的父亲鲁继曾

从父亲身上可以看出他们这一代人有很多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他们这一代人的另一个特点,是自由独立的品格。他不屈服于潮流,这是我们中国人目前最缺的,也是最需要尊重的。再就是爱学习,对知识探究有一种热诚。在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就是坐在家里看书。

一、乱世孤儿

我父亲生于1892年，就是甲午战争之前。甲午战争发生在1894年。我查了一下历史，就在他出生前后的一年里，日本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所以，父亲是生于患难之中的。我母亲生于1893年，两人相差一岁。

两人都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有些人好像不屑于从宏观来分析问题，实际上你不能不受大时代的影响。当然，每个人受的影响，在他的具体的生活故事中的表现是不同的，然而这种影响总会在个人生活情境、生活故事中反映出来。我父亲出生在四川阆中，小时候是一个苦孩子，父亲的父亲是一个小官僚，在外面做官。

四川阆中在靠近长江出口的地方，是一个文化名城，也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小县城。它很有历史文化底蕴，那里的醋很出名。因为它刚好位于长江的出口，那个时候也是交通要道。三国时期，是张飞占领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很高的张飞像。还有很多古迹，去了以后，会从那里的历史古迹中，发现那里历史沧桑的风貌。红军长征也走过阆中。



父亲鲁继曾

阆中风景也很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跟哥哥从成都出发到阆中。当时四川有关部门特别派了车子,把我们送过去,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全都是盘山路,有很多90度的转弯,很险峻,走在前面的那辆省委秘书长坐的车就翻车了。21世纪初期,我们又去了一次,这次路就修得很好了,从成都出发三个多小时就到了阆中。我很奇怪,过去交通那么不便,那时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是怎么传进去的?后来才知道,是通过基督教。那里有教会,有教堂。现在去查,那里还有晏阳初的档案。晏阳初也在那里待过,留下了不少资料。

中国的开放是很奇特的,穷乡僻壤的地方,教会已经进去了,真正我们自己的比较先进的文化却还没有进去。当时,西方新的东西都是通过教会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的,全国都是这样。小时候我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很开放的城市。那时教会的牧师、天主教的神父,就进入现在的浦东了。那时浦东在上海是乡下。乡下谁去?牧师去了,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没去。有的神父讲一口浦东话,是上海乡下话。那时我们不理解是怎么回事,实际上,教会很有力量,它通过传道,通过人的信仰,影响了很多人。我的父亲,他后来思想上的变化,接受新的东西,也是通过教会得到的。

我爸爸是个独生子,我祖父也是个独生子。我父亲很少跟我们谈他的过去。我现在想,因为童年给他很多创伤。他父亲死得很早,死在外面。他那个时候还不到十岁,后来母亲改嫁,继父对他不好。这些还有一些材料,因为大夏大学要校庆,给他写了个传记[见本章附录]。后来,我父亲在上海工作,他的侄子、他的堂侄子来找过他。这些远房的亲戚告诉我们说,父亲小时候多次从家里逃出来,逃到他远房的叔父那里,他叔父全家都是基督徒。

为什么父亲不愿意回顾童年？第一个原因是贫困。他很少说，我们有时会发牢骚，他偶尔会说一两句：不要抱怨，我小时候连鞋都没得穿。就这么一两句。第二个原因是很孤独。他母亲改嫁，又生了孩子，顾不上他，他受了苦，也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所以，我哥哥欺负我，他有时就会跟我哥哥讲，你应该知道你有多幸福，你有姐姐、有妹妹，我那时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两句话，就可以看到一种内心的孤寂。第三个原因是很伤他的自尊心。在那个时代，母亲改嫁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的母亲，也没有谈过他的父亲。由此可见，他在逃避这段经历。可能在他的记忆里这段经历很痛苦，他有意识地将它封闭起来。

他很痛苦，心里有很多委屈，包括受到虐待。家里面又有了孩子，继父又对他不好。他为什么那样说我哥哥呢，可能就是因为他觉得，如果有一个兄弟姐妹，就有一个人可以倾诉。他没有地方诉苦，确实很痛苦。他基本上是一个苦孩子。后来，遭到继父的痛打，就从家里逃了出来（这也是亲戚讲的）。逃出来后，就去了一个教会学校，牧师把他收留下来。他就在教会学校里半工半读，当时大概才十几岁。后来又只身从阆中来到成都，那么小的年龄，一个人徒步从阆中走到成都。我曾经跟我哥哥一起回阆中，从成都坐汽车到阆中还走了十二个小时。当时我真是很有感慨，父亲那时还是一个小孩，怎么能从阆中走到成都呢？那时都是小路、山路，翻山越岭的。我想他身上肯定缺钱，他怎么走？那个时代的人，那种自我奋斗的东西，很强烈。这也是生命的力量。他在家是再也待不下去了，你看这么难走的路，山路啊，他都不怕！如果能待下去，肯定是不走路的。后来开通公路了，坐车也要走十几个小时，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路，可想而知

了。所以，我真的很佩服他。

成都有父亲的一个堂叔，他们一家人对父亲很好。他的后代，就是我的堂姐、堂哥，我们后来还有来往的。有个堂姐，我在南京时，还接我去她家玩。她是个护士，后来去了香港，又去了加拿大。我去加拿大的时候，还去养老院看过她，那边养老院条件非常好。她是一个基督徒，基本上能安度晚年了。像这样的亲戚，我至今还跟他们有来往，我想我父亲对他们怀有一种感恩的心。

二、求学之路

前面就是父亲的童年。后来父亲在成都念中学。半工半读念中学，之后被保送上了之江大学。之江大学就是现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前身。之江大学是教会学校。那时在华东地区有好几所教会大学，在浙江是之江大学、苏州是东吴大学、南京是金陵大学、在上海是圣约翰大学。这是教会办的几所名牌大学。他就在之江大学念书，估计没有念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参战了，派出去了一些劳工，相当于工兵，需要翻译，父亲就去应聘翻译了，可能报酬是相当高的。他能说英语，在法国做翻译，所以，他积累了一些钱，后来回国后，再去美国留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

阆中的牧师中有美国人，那里还有牧师的墓。像这样的人，就在那里扎根，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这样的人是把整个生命放在这里，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所以，中国近代化的开启跟西方教会是很有关系的。从宏观上讲，大量的基督徒进入中国，肯定是有政治目的和

价值观目的的。但是，在具体的过程中，它的确起到了开智作用，也许主观上没有他们自己讲得那么好，但是在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那些教徒，作为个体，他们大多数是很善良的。政府的目的跟每一个传教士的目的不会是完全统一的，有些传教士真的是出于一种信仰。我们过去作为政治批判，只看到西方国家政府的政治目的，没看到传教士个人的美德与作用。现在我们说研究历史，也要研究个人的生活史，从个人来看，就会有不同的发现。比如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保护很多中国妇女的华群（魏特林）那样的一些人，你说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我认为，大多数都是出于仁爱之心。但是，它用一种宗教形式，我们不完全赞同这种形式。但是有一种仁爱之心，我们得承认。当然，也不排除教会里有一些人有其个人的企图。

从我父亲来讲，实际上是教会培养了他，他曾经说过教会想把他培养成神职人员，他没有接受。开始的时候，他是学医的。像他们那



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留影(右)

一代人，比如鲁迅，他们开始都学医，想治病救人，但是很多人很快就转变过来了。他跟我讲，他的转变还有一个个人的理由，他不能看人流血，他学不了医。后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跟陈鹤琴等人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属于前后的同学。

在中国大量搞教育心理学的人，都是从哥伦比亚大学出来的。那时，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科还是很有名的。杜威也在那里，所以大家是心向往之的。

那时出国留学的，大都是硕士，很少

有博士。连胡适都不是博士，是后来别人给他的，类似于荣誉博士。这批人都回国了，没有滞留国外，也可能那时的条件不允许他们留在美国，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反正大多都回国了。这个现象跟我们现在的出国留学生很不一样。当然，有些人是用庚子赔款资助出去的，这些人是要回来服务的。但父亲不是用庚子赔款出去的，是他自己积累了钱出去的。他们这一批人，成长于甲午战争前后，爱国情结是很强的。从科学救国到教育救国，都是这种爱国情结强烈的表现。一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像钱学森这一批人，他们也是想尽办法要回来。可能他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是很强烈的。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写的一篇文章，畅想抗战胜利以后应该怎样，流露出对国家的一种热爱情怀。

他回国以后，在之江大学教了一段书。我想是在 1923 年左右，因为我妈妈怀我姐姐是 1923 年，她在之江大学穿着高跟鞋爬山，之江大学在山上。之江大学是美国的教会办的，哪个教会就不知道了，属于基督教。当时，天主教最有名的学校是上海震旦大学。基督教在华东地区的力量比较大。现在，我们出了一套基督教大学史方面的书，像金女大、金大、圣约翰都有。整个中国基督教会学校真的培养了不少人。我们现在渐渐成熟起来了，一件事情能够分两面看了，我们以前往往比较绝对化、走极端。教会能够传播文化，从这方面来讲肯定是件好事情。但是，通过这种途径来占领中国，那就是另外一回事，那就不好了。政府的目的、教会的目的和个人的目的，这三个层次都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往往把三者混在一起了。

所以，历史真的要把它具体化。后现代有些观点就该肯定，历史不要只是一种宏大叙事。宏大叙事之下，很多历史本身的真面目都